

家族涉入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关系的文献综述

——基于对调节因素的探索

徐敏丽, 韩慧慧

(江南大学 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家族企业表现出超越非家族企业的高积极性,在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研究主题,探讨慈善背后的行为动机,其中社会情感财富的发展不仅使得该研究领域在理论层面得到补充,也使得家族性动机逐渐受到关注。全方位探讨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从家族涉入层面探究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并寻找内外部的情景因素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这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行为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家族涉入; 慈善捐赠; 行为动机;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5-0105-05

一、引 言

家族企业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对各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民营企业过去常被认为“为富不仁”,但依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7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民营企业捐赠数目占到企业捐赠总额的半数以上,其中家族企业更是成为响应慈善呼吁的表率,因此,近年来有关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早期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的动机曾站在企业角度进行过研究,但随着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兴起,家族涉入对企业的慈善行为选择所带来的影响逐渐受到重视。总之,理论层面的逐渐完善以及实

证研究中对相关调节因素不断探究,使得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对今后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战略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动机

(一)家族企业的界定

在家族企业研究兴起的 20 多年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家族企业进行过界定,但关于家族企业的准确定义至今没有定论,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在家族企业同一研究主题上的研究结论常常不尽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家族企业的定义方式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本质法,其二是家族涉入要素法。

表 1 界定家族企业的两大方法

Tab. 1 Two methods of defining family business

方法	界定的核心要素	学 者	缺 陷
本质法	企业的战略方向、行为、家族性资源、传承意愿等要素	窦生军、贾生华(2004) ^[1] ; Astra- chan 等(2002) ^[2]	主要从理论层面界定,要素测量难以实现
	所有权	储小平(2004) ^[3]	
要素涉入法	管理权	孙治本(1995) ^[4]	要素涉入程度的标准不统一,也未给出要素的精准测量
	所有权和经营权	Anderson 等(2003) ^[5]	
	代际传承	Aronoff 等(2010) ^[6]	

[收稿日期] 2019-03-01

[基金项目] 江南大学荣氏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家族企业控制权、社会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018JDZD05)。

[作者简介] 徐敏丽(1973—),女,山西运城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政策;韩慧慧(1995—),女,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政策。

由于要素的测量难度、测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无论是本质法还是要素涉入法在界定家族企业上均存在缺陷。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二分法界定家族企业,原因有二:一是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明晰的划分,而且这种划分会限制交叉研究;二是企业内部存在异质性,而二分法使得家族涉入的水平和类别被隐藏了。当前研究者们大多认同家族涉入企业是家族企业特有的表现特征,在实证研究中这也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关于家族涉入的要素也基本形成统一,主要包括家族所有、管理以及治理等方面,但是有关涉入比例和范围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7]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采用家族涉入的程度指标来间接测度,即将民营企业看作是家族涉入的连续分布变量,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家族性因素对企业治理和行为决策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特性。

(二)慈善捐赠行为的动机

与家族企业“为富不仁”的现实传闻不同,理论界指出家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要优于非家族企业,这也得到许多实证方面的支持。关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从企业层面出发得出以下四种:利他动机、战略性动机、政治动机以及管理效用动机。^[8]近年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发展也使得家族性动机得到关注。

1. 企业层面的传统动机

企业层面的四个动机按照主体需求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三类: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谋求企业、管理者自身发展的利己主义以及从企业战略高度出发的互利动机。

利他主义是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企业的仁义行为,是慈善捐赠背后最直接原始的动机。通过这种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9]政治性动机强调企业发展的政治氛围与周围环境的重要性。企业为增添政治利益,会借用慈善捐赠向政府寻租,通过降低政府管制约束,获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府支持,这在企业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时,更能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10]管理效用动机是指企业管理者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通过进行慈善捐赠提高自身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获取担任政府官员、政协委员等满足自身的特殊要求和偏好。贾明等(2010)研究表明出于自身对获取相关政治资本的追求,高管会推动公司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作为对利他动机的补充,战略性动机指出慈善捐赠还可以被工具化,协助企业进行市场挖掘,促进企业实现额外的经济利

益。^[11]Mcalister等(2003)指出通过慈善行为吸引关键利益者的关注,能收获企业声誉、品牌形象等无形资源,进而实现组织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共同提升^[12]。

2. 家族层面的社会情感财富动机

以往在研究家族企业时,多将其等同于普通性质的企业,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框架展开探究,并没有形成自身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但“家族”因素的存在使这些传统理论在企业某些行为决策上的解释力有限。家族企业由于对代际传承和家族控制权的追求,使得家族控股股东更加注重追求声誉、合法性与社会资本等非经济效益。Gómez-Mejía等(2007)将这些非经济效益称为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包括家族控制和影响、情感依恋和代际传承意愿等在内的五个构成维度。^[13]近年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兴起是对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理论层面的较好补充。SEW于家族成员而言是内在固有的,它从理论层面解释了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家族偏好和动机。^[14]

三、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的研究现状

家族企业是全球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我国民营企业也普遍采取家族持有的方式。从古至今我国就不乏行善者,诸如“荣氏”“曹德旺家族”等家族企业的善举更是数不胜数。家族企业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有着突出表现,而家族对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掌控也使企业慈善捐赠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

(一)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趋势

关于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早期研究多数集中于探讨家族与非家族企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差异,少数关于家族异质性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研究也仅限于探究两者之间的大致关系,考虑相关情景因素影响的文献较少,而探究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家族异质性以及相关调节因素影响的探究也趋于丰富。

(二)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的研究现状

1. 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果

关于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研究逐渐丰富,但国内外在此问题上的探究结论却不尽相同。国外相关研究显示家族涉入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对其慈善捐赠并未显示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2 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趋势

Tab. 2 Research trend of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in family business

影响因素	研究主题	主要学者及观点
家族性因素 ↓	二分法区分家族与非家族企业,探究企业性质对于慈善捐赠的影响	家族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强度均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蔡地等,2016) ^[15]
家族异质性 ↓	探究家族异质性—家族涉入程度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国外:无显著影响(Cruz等,2014) ^[16] 国内:家族涉入显著促进企业慈善捐赠(陈凌等,2014) ^[14]
调节因素	探究内外部调节因素对家族涉入在影响慈善捐赠中的作用	制度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许金花等,2018) ^[17]

而国内多数研究表明家族涉入会正向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与捐赠的额度。二者研究结论的不同大致来源于两方面的差异:第一,国内外学者选取的研究样本特征存在较大不同。家族性因素对我国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较大。第二,外部制度环境也存在很大差异。我国经济发展较晚,在经济、法律、政治环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的发展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外部制度环境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行为抉择。

2. 相关调节因素的探索成果

鉴于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结论的差异,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对相关调节因素的探究中,成果也逐渐丰富。现有文献对调节因素的探索大致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层面。

(1) 外部因素

外部调节因素以制度环境最具代表性。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指出无论何种组织都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通过适应环境而生存。对于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而言,现有政策体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尚不完善,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政策差异较大。^[18]在此背景下,我国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选择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普遍选取樊纲和王小鲁(2011)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inst)的量化指标,它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各省份、各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差异。^[19]但市场化指数也存在数据中断和最新数据缺失的问题,影响了研究的连续性和进展。目前甄红线等(2015)学者利用趋势外推的方法初步解决了数据缺失的问题。^[20]制度环境会显著影响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作用的效果和强度。^[17]

(2) 内部因素

考虑到家族企业的内部异质性,内部调节因素可以按照公司治理层面和资源环境层面进行划分,具体包括家族控制类型、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强度、冗余资源和绩效水平等。

企业治理层面包括家族控制类型、股权结构和

高管激励强度等方面的因素。家族控制类型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代理成本问题上。蔡地等(2016)学者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类型不同使家族控制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产生于家族成员积极经营企业和不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15]此外,作为企业治理的主要层面之一,股权结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治理效率和战略决策。其中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是代表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指标。史敏超(2010)指出股权制衡效果越好,越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21]最后,家族企业同时追求财务目标与家庭情感等多目标情形,因此,存在利益权衡的问题,而理性的职业经理人会选择定位于较易衡量的目标上,此时对高管的激励强度会影响其行为决策。更高的激励强度常使职业经理人更关注财务目标的达成,而忽略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22]

企业环境层面包括冗余资源和绩效水平两方面。作为一种闲置的潜在资源,冗余资源常被认为是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冲击的“缓冲器”,是企业进行资源置换和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家族成员为了获取社会情感财富与公司的长期发展,家族企业往往更愿意进行慈善捐赠。Brammer等(2005)学者也验证了这一结论。^[23]其次,陈志军等(2015)也结合代理模型和行为模型指出不同绩效水平下家族企业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在社会责任问题上的态度出现分歧。^[24]当企业出现绩效困境时,家族企业会减少承担社会责任,而代理人会更加注重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弥补财务绩效的不足,取悦股东。这展示了多目标情形下企业代理人利用践行社会责任满足自利的投机举动。

3. 调节因素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影响的研究现状

下面将代表性文献中的主要调节变量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进行梳理,找出当前研究仍可改进之处,并汇总到下表3中。

表 3 调节因素对家族涉入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影响的研究情况

Tab. 3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facto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volvement and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调节因素	样本及方法选择	结论	学者	研究不足与努力方向
外部因素	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 logit 和 tobit 回归	制度环境起正向调节家族涉入对企业社会责任(包含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	许金花等(2018) ^[17]	市场化指数数据缺失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一,但各有利弊;管理权涉入方面,采用虚拟变量会隐藏涉入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差异,而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高管的比例会改善此问题
	2001—2010 年上市的市值超过 5 千万欧元的欧洲 598 家族和非家族上市公司;面板随机效应模型	二者在社区表现上没有明显差异,其中社区这一维度包括慈善捐赠。制度环境在其中起到催化剂作用(行业标准、技术强度负向调节)	Cruz 等(2014) ^[16]	
内部因素	家族控制类型	2004—2012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面板 probit 和 tobit 回归	家族控制促进企业慈善捐赠,但此种正向作用仅发生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不分离的企业(受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	蔡地等(2016) ^[15]
	股权结构	200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多元回归	股权集中度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股权制衡则相反	史敏超(2010) ^[21]
	冗余资源	2013 年上海地区 176 家企业;截面数据层级回归	未吸收的冗余资源(即组织中未被投入和利用的资源)越多,越会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田雪莹(2015) ^[24]
	激励强度和绩效水平	2010—2013 年度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数据;面板数据多元回归	家族控制正向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中高管激励水平负向调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绩效不佳会促进代理人的社会责任投资行为,以弥补财务绩效的不足	陈志军、闵亦杰(2015) ^[25]

(三)研究述评

当前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研究领域逐渐得到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仍有不足与待改进之处。首先,社会情感财富在实证层面的运用有待加强。为数不多的研究仅限于在社会情感财富的个别维度展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够,其中指标测度上的难度是主要限制因素。其次,对调节变量的探索仍需深入。在影响家族涉入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调节变量的现有研究中,对家族成员人物特性层面的考察较少,而家族成员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其人物特性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对中介机制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中同时考察调节和中介层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而构造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既可以全方位地探究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因素,也能直接揭示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的慈善行为选择。

四、结 论

本文通过梳理有关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

及其相关调节因素的文献综述,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出现,不仅使家族企业研究领域有了自身的理论基础,也使学者们在家族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中开始考虑家族性因素,为学者们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成果,但其在在实证层面的贡献欠缺;(2)对内外部相关调节因素的探索有助于解释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关系的研究结论的差异,但对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人物特性方面的考察欠缺;(3)在家族涉入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研究中,对于调节效应与中介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是今后研究中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这不仅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我国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和战略选择提供重要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窦军生,贾生华.家族企业界定方法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6(9):21—24.

- [2] ASTRACHAN J H, KLEIN S B, SMYRNIOS K X. The F-PEC scale of family influence: a proposal for solving the family business definition problem[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2,15(1):45-58.
- [3] 储小平. 家族企业研究: 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5):51-58.
- [4] 孙治本. 家族主义与现代台湾企业[J]. *社会学研究*, 1995(5):56-65.
- [5] ANDERSON R C, REEB D M. Founding - 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S&P 500[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3,58(3):28.
- [6] ARONOFF C E, WARD J L. Family-owned businesses: a thing of the past or a model for the future? [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0,8(2):121-130.
- [7] 杨学儒, 李新春. 家族涉入指数的构建与测量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5):97-107.
- [8] ZHANG R, ZHU J, YUE H, et al.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giving, advertising intensity, and industry competition level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94(1):39-52.
- [9] CAMPBELL L, GULAS C S, GRUCA T S. Corporate giving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er social consciousn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9,19(4):375-383.
- [10] OHAGAN J, HARVEY D. Why do companies sponsor arts events? Some evidence and a proposed classification[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00, 24(3):205-224.
- [11] 贾明, 张喆. 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 [J]. *管理世界*, 2010(4):99-113.
- [12] MCALISTER D T, THORNE D M, FERRELL O C, et al. Business and society: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citizenship[M].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2003:458-473.
- [13] GÓMEZ-MEJÍA L R, HAYNES K T, NÚÑEZ-NICKEL M,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52(1):106-137.
- [14] 陈凌, 陈华丽.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8):90-101.
- [15] 蔡地, 沈达勇, 刘雪萍.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加“乐善好施”吗[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38(2):103-114.
- [16] CRUZ C, LARRAZA-KINTANA M, GARCÉS-GALDEANO L, et al. Are family firms really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38(6):1295-1316.
- [17] 许金花, 李善民, 张东. 家族涉入、制度环境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J]. *经济管理*, 2018,40(5):37-53.
- [18]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28(2):275-296.
- [19]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46(9):4-16.
- [20] 甄红线, 张先治, 迟国泰.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J]. *金融研究*, 2015(12):162-177.
- [21] 史敏超. 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J]. *北方经济*, 2010(10):13-15.
- [22] 许晓明, 姚凯, 陈扬. 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模型及其理论探讨——基于“家”文化的视角[J]. *当代财经*, 2012(9):72-79.
- [23] BRAMMER S, MILLINGTON A.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hilanthropy: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5,61(1):29-44.
- [24] 田雪莹. 冗余资源、慈善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1(4):93-102.
- [25] 陈志军, 闵亦杰.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J]. *经济管理*, 2015,34(6):20-25.

(责任编辑: 蒋萍)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volvement and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A review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XU Min-li, HAN Hui-hui

(Jiangn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As the highest for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aritable don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booming. Among them, family business, as the main bod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s high enthusiasm beyond non-family enterprises.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business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and discusses the underlying mo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motional wealth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field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enhances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motivation. Wi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otives of family business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n all-round way, exploration into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 from the family involvement level, and examination into regulato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al factors, are rather informative for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odels and behavior selection.

Key words: Family involvement;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al motives; Influencing factors